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始末 及与中国文坛的关联

徐 静 波

一、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 的缘起与成立

当时以及后来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日本中国研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正式对外公开它的组织名称,是在1934年8月4日在东京为来访日本的周作人和徐祖正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同一年10月29日,在东京帝国大学佛教青年会馆第一次举行正式的研究例会,翌年的1935年3月5日,出版了其机关刊物《中国文学月报》第一号^①。

何以会在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1934年在日本诞生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并在它的第一期^②艰难维系了长达9年的岁月?它在当时和日后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地位和影响究竟如何?本文将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对此进行梳理并力图做出完整的描述。

中国文学研究会最初的核心人物是竹内好(1910—1977)和武田泰淳(1912—1976)、冈崎俊夫(1909—1959)三个人,其中,竹内是该组织的领袖。他们均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冈崎毕业于1933年,竹内毕业于1934年,武田1931年进入东大后,因参加左翼活动而被警署三次逮捕,此后也就不去上

课且未交纳学费,事实上也就终止了学业。

他们何以会组成这样一个学术团体并且以后在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做出如此卓越的成就,这里有必要对他们三人此前的人生履历进行简略的考察。比较有意思的是,冈崎和武田都出生于僧侣家庭(日本的僧人在明治5年也就是1872年获准可以娶妻食肉),自幼习读佛经(佛教在6世纪中叶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传入日本后,均采用汉译佛经),武田在离开东大后,加入了芝·增上寺的加行道场,获得了僧侣的资格,从小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触及,养成了较强的古汉语阅读能力。冈崎和武田先后就读于浦和高中,都是以后准备升入大学文科的学生组织“浦和文化会”的成员,彼此稔熟,武田在较早就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高中期间阅读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去了一家名曰“第一外语”的私立学校学习现代汉语,并尝试阅读胡适、鲁迅等新文学家的作品,自己还曾做过汉诗二十首。而冈崎在高中期间,似乎对俄国更感兴趣,他曾在“浦和文化会”上发表过“俄国的农奴制和文学”的报告。而竹内则出生于医师和官吏的家庭,自幼与中国并无家学渊源,他自己曾坦言,进大学后仍无法顺利地阅读古汉语(日语称之为“汉文”,包括中国的古籍和日本人用古汉语



西
译
史
话



撰写的文献),甚至对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关切,他之所以选择这一专业,主要是因为不必考试,进了学校,即使不怎么去上课,届时也可顺利毕业。事实上,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名望门第,选择中文科的青年,一般并不被认为是优秀人才。同时代的文学评论家本多秋五带点揶揄的口吻说:

“据我所知,昭和初年的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不是个有人气的学科,进去的不是和尚的儿子就是出身汉学家庭的子弟,一般人若无特殊的情况,是不会想进这样的学科的。”^③

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大概也就没有日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诞生。这里,作为该组织领袖人物的竹内好 1932 年的中国之行,可谓彻底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也是中国文学研究会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机缘之一。这一年的 8 月,他获得了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的一半资助,随一个学生团体经朝鲜半岛到中国来旅行,他到中国来的动机,一开始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切,他后来自己曾说:“我那时学籍虽然放在中国文学科,但并没有真心想要搞中国文学,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这次旅行有旅费的补助,便想利用这一制度来满足一下青年时期特有的放浪癖好。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被那里的风情和人物所醉倒了。即使到了期限,我也不想回日本,请家人再寄了旅费过来,一个人呆到寒风将要袭来的季节,每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我与中国的结缘,就始于这次北京之行。”^④“于是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从此就想真心研究中国,买了若干的书刊带回来,开始了我的第一步。因为我还无法阅读汉文,于是就从现代汉语开始。”^⑤

但竹内回到日本后,依然很少去听课,武田在终止学业之前对盐谷教授和宇野教授的课也只有各听过一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也是后来促成他们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一个重要缘起,就是对当时东京大学汉学研究的不满。东大当时的支那哲学课支那文学科,将讲授和研究的范围完全局限于中国的古典之内,根本不触及中国的实际,研究的方法也相当的老套和陈旧,另一个学术重镇京都大学,虽然研究的氛围不错,但对象依然囿于近代之前。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武田泰淳在 1943 年回忆说:

“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对汉学这样的东西抱有反感。与其说是抱有反感,不如说是完全没有兴趣。通过汉学来接触支那的文化,总不能获得满足,在感觉上也很不喜欢。倒也不是说对汉学的本质已经看得很明白,而是对由汉文所笼罩的这种气氛,由汉学所散发出来的儒教的冬烘气,怎么也无法适应。作为日本人来说,应该还有其他研究支那的途径。……于是我们在昭和九年(1934 年)开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支那的现代文学、支那的支那学者的业绩,展开了调查。”^⑥

当然,1930 年代初期,日本的文坛或研究界并非对中国的新文学完全视若无睹。事实上,在 1920 年创刊不久的《支那学》杂志 11 月号上就连续刊出了后来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涌动着文学革命的长文》,该文详细介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的具体内容,介绍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革新主张,并且述及欧阳予倩的戏剧改良运动和俞平伯、沈尹默的新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内容十分详备。1922 年出版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大西斋等编著)收录了胡适、康



白情等人的作品,1920年抵达北京的基督教神父清水安三在1924年出版的《支那的新人和黎明运动》一书的第十章即为《现代支那的文学》,他虽然不是一个文学研究家,却以自己在北京的实际感受向日本读者传递了最新的信息。此后,在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村松梢风的《魔都》、谷崎润一郎的《上海交友录》等都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国文坛的新动向,1926年7月,当时在日本影响颇大的《改造》杂志出版了夏季增刊“现代支那号”特辑,收录翻译了丁西林、郭沫若、田汉的戏剧各一篇,张资平、凌淑华等的小说共五篇,徐志摩等的新诗共三首,胡适、陈西滢等的评论共八篇,还刊载了丰子恺的漫画。应该说,时至1920年代末期,日本的文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坛的新气象。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尤其是作为最重要的学术重镇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内,对中国的研究依然沉湎于故纸堆里,气氛沉闷,竹内好甚至用了“丑恶”“凡俗化”“学界荼毒的余孽”等充满愤懑的词语来描述当时的状况^⑦。

出于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新文学的兴趣和关注和当时以东京大学为首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现状的强烈不满,竹内好决定联合身边的同志来创办一个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团体。这一想法大约产生于1933年后半期,据现有的文献稽考,自1934年1月初开始与友人商议此事。这里,将其至成立的轨迹做一个梳理,比较可靠的文献,是竹内好1972年发表的当年的日记:

“1934年(以下同)1月4日。…午后,横地(伦平)、冈崎(俊夫)两氏来。杂谈,中国文学研究会具体的成立未达成。”

“1月24日。…十一时许,武田(泰淳)来,谈两小时左右归。劝其参与中国文学研究会。对其已阅读相当数量的现代

小说颇为感佩。”

“3月1日。横山、佐山、武田、冈崎来访,举行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的准备总会。决定会名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决定每月1日、15日举行两次例会,出杂志。”^⑧

以后,按照3月1日的决定,该会基本上每月举行两次小型的研究会,地点基本上在竹内的家里,内容有武田关于清朝小说的发表,横地关于蒋光慈的研究等,形式也只是一个小沙龙而已,且研究会取消或中断的情形屡屡出现。横山和佐山,是竹内支那文学学科的同级同学,以后逐渐与该组织疏远,并未参与太多的实际活动。除上述诸人之外,经常参与研究会活动的还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杨哲民和顾志坚等中国人。期间和之后,竹内陆续结识了后来成为研究会重要成员的小田岳夫(1900—1979,小说家,《鲁迅传》和《郁达夫传》的作者)、松枝茂夫(1905—1995,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周作人作品和《红楼梦》的译者)、增田涉(1903—1977,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译者)。

当时研究会成员获得中国文学新书刊的途径主要有三处。一是设在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有两千余人,该书店经营各种中国的最新书刊,主要面向中国学生,同时也成了研究会成员经常光顾和购买图书的所在;二是甲午战争后由田中庆太郎开设在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主要经营中国典籍、中文教科书,后来也陆续出售各种新书刊^⑨;三是曾在北京长期留学、竹内1932年在北京期间结识的池田孝在北京所购入的大量中国新书刊,带回日本后,因自家寓所无法存放,长期寄存在研究会内。通过这三个途径,研

究会的成员几乎读到了所有当时中国出版的重要文学书刊,包括沈从文、老舍、茅盾、洪深、田汉、丁玲等的最新作品。

外人正式知晓、或者说研究会正式对外公布自己的存在,是在1934年8月4日在东京举行的欢迎自中国来访的周作人和徐祖正的晚宴上。其时,研究会虽然尚未成为一个正式的团体,但它频繁的活动和人员间的往来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充分注意,7月19日,在街上巧遇的当时已颇为知名的著作家和评论家新居格(1888—1951)对竹内说及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和徐祖正将来日本采购日文书刊,文学界拟举行欢迎会,不如就由中国文学研究会来出面组织。竹内欣然应允。此后,竹内等积极投入晚会的筹备工作。晚宴如期在东京日比谷的山水楼餐馆举行,出席者共25名,包括佐藤春夫、岛崎藤村、与谢野宽、村松梢风等知名作家,主办方明确标明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媒体对此进行了热情的报道,也就借此对外正式宣布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⑩。

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筹备,中国文学研究会在1935年3月5日出版了它的机关刊物《中国文学月报》第一号,刊登了竹内好和冈崎俊夫等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还用中文刊出了一篇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杜宣的文章《对研究中国文学者的一点贡献》,文末对作者的介绍是中国留学生、《艺术研究会》的同人、文学研究家。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只是在末尾很小的篇幅有一篇《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出自竹内好的手笔)的短文,表示:“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以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日支两国文化的交欢(此词在此颇难翻译,大约有“愉快的交流”之意)为目的的研究团体,现在具体的事业内容为例会(每月一次)、恳话会、月报发行等。将来拟逐渐出版研

究杂志、举办展览、讲习会,设立文化俱乐部。”^⑪

由此,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日本正式开始了它的卓有影响的学术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同时它几乎也是战前唯一以“中国”来称呼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

这里对“支那”这一称呼稍作检讨。“支那”这一称呼,源于佛教文化交流中西域(主要是天竺)对中国本土的指称,在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已有出现,在日本的文献中,最早大概出现在作为遣唐使来中国的空海和尚的《性灵集》中,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支那的称呼频频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是新井白石的地理著作《西洋纪闻》,但历史上对中国的称呼,主要以王朝的名称如汉、唐、宋、明、清等为常见,有时也用中华、唐土、中国。明治以后,官方文书中称中国为“清国”,但民间已普遍开始使用“支那”,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支那”一词多少已带有贬义色彩。但当时一部分中国人也经常使用,比如章太炎就曾在《正疆论》一文中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其时日本对中国一词,亦颇多忌讳,觉得有中央大国的含义,根据中华民国的英文译名,自行译为“支那共和国”,在外交文书上亦称中国为支那,招致中国人的反感。直到1940年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根据汪伪方面的要求,才在官方文书上改支那为中国,但民间一般仍称支那,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才废除支那的称呼,逐渐改用中国^⑫。

根据竹内好有些模糊的解释,当时之所以取名中国文学研究会,是因为觉得支那多少有些老大帝国的形象,代表了往昔的中国,而中国一词则具有新生中国的意象,为了与传统陈旧的汉学划清界限,便使用了中国一词。但实际上,即便是中国文



学研究会的同人,也未必具有这样明确的意识,在日常的表述中,无论是口语还是文章,较多使用的仍是支那,尤其是当1939年竹内好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呆了两年之后,他也几乎放弃了使用中国一词。为留存历史的真面目,本文在引用日文文献时,保持原文的汉字名称,不作改动。

二、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 的解体与复活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心骨无疑是竹内好,发起人是他,具体的经营乃至杂志的编辑也是他,在他1937年10月去北京之前以及两年后归国以后,研究会的所在地和杂志的编辑部发行所均设在位于东京市芝区白金台八十九号他的家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他是最坚定的主张者和计划者之外,还在于他东大毕业后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1932年夏秋之际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非常期望毕业后能到中国去工作,当时他觉得比较理想的是总部设立大连并在北京、上海设有分所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但最终未能进入,而其他的几位主要人物如冈崎毕业后在《时事新报》供职,后转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教授中国人日文,不久又进入《朝日新闻》社;武田则暂时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在黄檗宗禅寺长泉院里担任了住持;松枝茂夫为了生计,当时在明治大学等几所学校兼课,每日四处奔波。唯有竹内,相对而言有较多的闲暇。

1937年,竹内好经日华学会的友人的斡旋,获得了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第三种补助金的资助,得以到北京去留学两年,名目只是进修语言而已,于是经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介绍,于6月将研究会的事务所从自己家里迁到了本乡区二丁目四番地

六的一幢名曰和田大楼的顶楼,房租相当低廉,但每月的租金、杂志编辑费等15日元暂时仍由竹内负担。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竹内的北京之行延迟到了10月。几乎在同时,武田被应征入伍,作为辎重兵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大陆战场。在竹内逗留北京的两年期间,杂志的编辑主要由松枝茂夫来担任,后来加入研究会并成为重要人物的实藤惠秀、小野忍则在一边加以辅助,自1938年1月发行的第34号月报起,编辑发行人的姓名便由竹内好改为松枝茂夫,杂志依然顺利出版,各项学术活动基本上也坚持举行,虽然后来实藤等也去了北京留学。1939年4月,松枝应聘去了九州大学任教,杂志的编辑便交给了小野等轮流担当。

1939年10月,竹内期满归国,重新接掌了研究会的日常工作,自这一年12月发行的月报第57号起,编辑发行人的姓名重新改为竹内,并在翌年的1月末,将在和田大楼的事务所重新迁到了竹内的家里,地点在目黑区上目黑五之二四六八。其时竹内的父亲已经去世,家境渐趋艰难,1940年4月起竹内在回教圈研究所正式任职(每周出勤四次),同时在几处学校教授中文,但余下的时间仍全心扑在研究会工作上。

1940年4月,《中国文学月报》在出版了第59号之后,决定自第60号起改由位于东京神田区的生活社出版发行,刊名改为《中国文学》,页数由原本薄薄的12页改为48页,对外公开发售,编辑部也因此第一次获得了编辑费并向作者支付稿费,在此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但刊号和卷数与原杂志相衔接,新刊名起为第6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其时已由《中国文学月报》改名为《中国文学》的第80号(1942年1月1日发行)刊登了



由竹内好撰写但无署名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宣言)》,表明因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日华事变(即七七事变)的难以言诉的难受的心情得以彻底廓清。”事实上,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他们这批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同人心情十分郁闷,内心也十分的矛盾。竹内好等以为如今将矛头对准了英美,整个局势将有大的改观,但实际上日本国内形势由此更加险恶,文学界的气氛也更加压抑,1942年5月成立了由军部作为后盾的所谓“日本文学报国会”,将所有的文学团体皆置于其麾下,竹内等当时的研究会主要成员都加入了报国会内的“外国文学部会”。但加入不久,竹内马上意识到参加御用的文学活动与该组织本身的独立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一时处于尴尬的境地。同年11月,文学报国会所操持的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举行,在大会的筹备阶段,当局数次派人来动员中国文学研究会正式出面欢迎接待来自中国(汪伪政府)方面的代表,竹内对此表示了拒绝,他在11月1日发行的《中国文学》上发表《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文,含蓄而又坚定地表示: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于日本文学报告会来说也许是一次绝佳的活动,但不是中国文学研究会要出席的场合。倒也不是说不欢迎支那的文学家。欢迎值得欢迎的人是我们的欢迎方式。……该做的事做,不该做的事不做。在昭和九年(1934年,其时周作人尚未沦为日本军部的帮手——引者注)周作人的欢迎会上正式成立的,但昭和十六年周氏来日本的时候,我们只在编辑后记中提了一句,至少没有举行公开的欢迎会。此外,在日本的俗流文学家为支那的三流文学家的横死(指刘呐鸥1940年被国民党锄奸队刺死一事——引者注)而大张旗鼓地追悼时,《中国文

学》却对此事毫无表示,倒是为在日本毫无追悼动静的蔡元培的去世,贡献了杂志的所有篇幅,正是出于我们一贯的态度。这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传统,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命运。我个人姑且不论,至少拥有公众立场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担当为官吏帮腔的角色,是我们的传统所不允许的。”^⑬

尽管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中国文学研究会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护自己独立的风格,但一方面中国的主要作家都已转移到重庆或延安,投身于抗日阵营,在日军的占领区或汪伪政府的管辖区内,大都由三流文人撑持着文坛,而另一方面军部对国内舆论的管制日益严厉,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编辑部同人于1943年1月23日在武田家中集会,经竹内好提议,决定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终止《中国文学》的编辑出版,1943年3月出版的《中国文学》第92号为其终刊号,在这一期上刊登了一则由竹内好执笔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停刊(原文为“废刊”)》,详细交代了各项善后事宜,而声明性的文字只有以下寥寥数语:

“鉴于当今内外的形势,中国文学研究会已完成了原本的使命,决定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停止杂志《中国文学》的出版。”^⑭

不过,在同一期杂志上刊登的竹内好的《〈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中对停刊举出了两点重要的理由,其一是今天我们的组织和杂志已经丧失了党派性(也就是独特性独立性),其二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态度对于大东亚文化的建设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

但事实上,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组织虽已解散,但同人间的关系并未涣散。

1943年8月25日,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开幕,此前被选为大会议



员的竹内好,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同年12月,竹内好被征招入伍,被编入中支(华中)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派往中国湖北省咸宁,1945年8月,日本战败,1946年6月返回日本。

战后,以前被军部压制或取缔的各种社团组织纷纷恢复活动,甚至连绝迹了十余年的共产党也重现了身影,可谓大地复苏,万象更新。其时,原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骨干竹内好、武田泰淳等虽然仍滞留在中国,但尚有冈崎俊夫、松枝茂夫、增田涉、实藤惠秀等八名主要成员仍健在,每周四在东京举行定期的例会,经实藤的建议,决定恢复中国文学研究会,继续编辑出版《中国文学》杂志,并由冈崎和千田九一两人负责编辑事务,于是在1946年3月出版了第93号的复刊号。由千田执笔的《复刊词》中有如下的表述:

“以前我们曾否定过支那事变(指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引者注)。我们是因为衷心热爱支那,无法切断日华之间的纽带,因而无法赞同这一事变的意图,所以对此表示否定的。(下略)。

战争以我们未曾预料的形式结束了。现在我们遇到了良机,得以重新组成研究会,复刊《中国文学》。被战争所否定的文化,在战败的意识上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站在战败所带来的唯一的恩惠——真实和自由的基础上,再一次来热爱邻邦支那,希冀通过亲近支那的文学来谋得日本文化的复兴,继而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⑮

就在杂志复刊后不久,武田泰淳在1946年3月底自上海回到了东京,竹内好也在6月底回国。竹内好对于在他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复活中国文学研究会和复刊《中国文学》感到很不愉快,拒绝为杂志撰稿。8月,他向千田和冈崎送去了洋洋数

千字的《备忘录》,对千田的《复刊词》和复刊后的杂志风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千田所说的“再一次热爱邻邦支那”的说法极为不满,并对杂志继续让在战争期间与大东亚政策靠近的生活社出版表示反对,但他所提出的最根本的一条理由是,复刊后的《中国文学》必须要有自己鲜明的党派性,“复刊《中国文学》若无对停刊的《中国文学》的否定,就无法具备重新起步的新的党派性。”他还提出了要追究在战争期间有关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的战争责任^⑯。千田等人对于竹内的深刻批评无法应答,曾请武田泰淳从中调停,无果。

但中国文学研究会继续活动,杂志也继续刊行,除了竹内外,所有健在的同人都继续为杂志撰稿。直到1948年5月出版的第105号上,才出现了竹内好的《文学革命——鲁迅的文学史背景》,但这一期恰恰也是复刊后的《中国文学》的最后一期,从此正式寿终正寝。客观而言,复刊后的杂志也具有相当的水准,增田涉最重要的著作《鲁迅的印象》最初就是在复刊杂志上连载的。但很明显的,它已丧失了内在的独特风格。原先几乎一直由竹内好执笔的编辑后记,不再具有犀利强韧的风格,杂志在后来屡屡出现了两三个月才出一次的合并号,也显出了它生命力的渐趋衰竭。当事者之一的松枝茂夫后来说:

“中国文学研究会是由竹内、武田、冈崎三人所创建、支撑下来的,但始终一贯掌握着其主导权的,无论怎么说都应该说是竹内的强烈的个性。复刊后的《中国文学》表现出了离开了竹内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机体的软弱性,这样说并不为过。”^⑰

1971年,东京的汲古书店决定将价值甚高、但世间所存已极为稀少的《中国文学》(包括其前身的《中国文学月报》)出版复刻本时,当时尚健在的竹内好坚决主张

复刻本只到第 92 号为止,93 号以后的不予承认。1977 年 3 月,竹内去世。尚存世的当年同人,不仅已寥若晨星,且都已迈入耄耋之年,出于保存史料的愿望,建议复刻战后复刊的《中国文学》。于是汲古书院在这一年的 10 月出版了 93—105 号的复刻本。

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 会的活动与成果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和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研究例会、恳话会、讲读会等活动,就某一主题讨论介绍研究会内外人员的相关研究心得和学术信息等。

其中例会比较正式,原则上每月一次,也有暂停和延期的。第一次例会于 1934 年 10 月 29 日在东京帝国大学佛教青年会馆(后来也常在帝大内的基督教会馆)举行,由 1930 年毕业于东京帝大支那文学科、当时已成为作家的一户务作“郁达夫论”的报告,1928 年毕业于东京帝大支那文学科、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的辛岛骁作“最近的中国文坛”的报告,与会者 50 人。研究例会的报告者除日本人外,也请来日本的中国作家或学者来做演讲,如第三次例会请当时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讲“关于周易”,第八次例会请访日的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日本占领时期曾出任伪北京大学校长)来讲“北京的日本文化研究现状”等。

恳话会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随意的同人间交流形式,不定期。第一次恳话会于 1934 年 12 月 9 日在东京山王神社境内的小泉亭内举行,由当时来日本求学的中国女作家谢冰莹讲“我的文学经历”,1935 年 5 月举行的第三次恳话会请当时来早稻田大学求学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家钟敬文讲

“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探求”等。

讲读会开始得比较晚,一开始研究会的设想中并未设计讲读会的形式,它的发起人主要是松枝茂夫。有记录的最早的一次是 1936 年 4 月 4 日举行的《浮生六记》讲读会,主讲人松枝茂夫,这一主题一直讲到 6 月 24 日。以后成为讲读对象的还有《红楼梦》、《金瓶梅》、《周作人散文抄》等,其中的《红楼梦》主讲人是来自中国的曹钦源(其时在日本京北商业学校担任讲师),其他主讲者多为松枝茂夫。

第二,出版《中国文学月报》(后改名《中国文学》),这部分在上文中已涉及颇多,这里就其内容做一些补充。《中国文学》,顾名思义是对中国文学所做的介绍和研究,且根据竹内好的发刊主旨,应该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但也未必都如此。比如第 2 号上有曹钦源的《音韵杂感》,实藤惠秀的《孙中山之死》,可谓都无涉文学,但都与中国有关,由此也可见该杂志的基本性格。值得注意的是,该杂志编辑了好几辑特辑,从中可一瞥研究会的基本倾向。第 6 和第 7 号先后编辑了“中国现代小品文特辑一、二”,介绍翻译了鲁迅、林语堂、郁达夫、周作人等人的作品,显示出了研究会同人对于当时中国文坛兴起的小品文热的关注。1936 年 11 月初出版的第 20 号为鲁迅特辑,在策划阶段并不知悉鲁迅已病入膏肓,只是同人们已充分意识到了鲁迅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这一辑不是鲁迅作品的介绍翻译,而是对鲁迅的论述,几乎涉及文学创作、小说史研究或相关的史料搜集,在杂志即将付梓时,突然接获鲁迅去世的噩耗,竹内好连夜赶译了鲁迅的一篇《死》,以表示对鲁迅的悼念。在第 22 号的作家论特辑中,被论述的作家有郁达夫、沈从文、曹禺、王鲁彦等。第 26 号则推出了“王国维纪念特辑”。不应被忽视的是



1940年5月初推出的“蔡元培特辑”(第61号),对蔡元培在文化教育各界的功绩有较为全面的叙述。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日本方面几乎对此充耳不闻,因为晚年蔡元培的坚定的抗日立场几乎妇孺皆知,但研究会重在文化建设,对他的文化思想贡献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与主流意识形态逆向而行,推出了纪念特辑。此外,还有“语言问题特辑”、“北京特辑”等。

第三,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几乎所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翻译家,他们除了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译作外,几乎都有各种翻译的单行本问世,在此无法一一枚举。比较重要的有冈崎译的丁玲的《母亲》(改造社1938年)、郁达夫的《沉沦》(东成社1940年)、巴金的《寒夜》(1952年),松枝翻译的《周作人随笔集》(改造社1938年)、沈从文的《边城》(改造社1938年)、《红楼梦》(岩波书店1940年),而竹内好和增田涉,则几乎是日本最知名的鲁迅翻译家,尤其是竹内好,以一人之力编选翻译《鲁迅文集》,可惜在完成了第6卷之后不幸去世。

作为研究会这一组织而言,较大的成果有下列两项。其一是自1939年开始与伊藤书店合作,策划出版“支那现代文学丛刊”,第一辑《春桃》(10月出版),第二辑《蚕》(12月)。其二是自1940年开始与东成社合作,策划出版“现代支那文学全集”。计划出版12卷,结果出版了8卷,第1卷为郭沫若的《创造十年》、第2卷为郁达夫的《沉沦》、第3卷为茅盾的《虹》、第4卷为萧军的《只有爱》、第6卷为巴金的《新生》、第9卷为《女作家集》、第10卷为《随笔集》、第12卷为《文艺论集》,译者均为研究会的同人。虽然规模有限,在当时也可谓是一项较有影响的译介工程了。^⑩

四、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 与中国文坛的关联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自然与当时的中国文坛有关联,但本文不着重于作品,而主要着眼于研究会成员与中国作家间的往来。

郭沫若与郁达夫。

郭沫若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坛上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与郁达夫等主导的创造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足迹,这些自不待言。令人有些费解的是,查阅创刊以后直至1940年改名前的《中国文学月报》(第1至第5卷),并无对郭沫若作品的任何介绍与评论。这大概与郭沫若1928年亡命日本后,即与文坛暂时分袂,沉潜于古代史和甲骨文研究的经历有关。研究会的同人自然是知晓郭沫若早年的文坛功绩,对他当时的学问也颇为景仰,有意与其交往。

研究会成员中,与郭沫若交往较早的当推松枝茂夫,其时研究会应该尚未成立。松枝1930年3月东京帝大支那文学科毕业后即去中国游学了半年,之前已有《中国文坛管窥》发表,对中国的新文坛一直十分关注,“当时正是创造社的全盛时代,自然我爱读的是郭沫若和郁达夫。特别是郭沫若的文章热情而率直,容易读懂,令我很开心”^⑪。回国后他经常驻足于田中庆太郎开设的书店文求堂,也曾有几本参与编著的中文教科书由文求堂出版,与店老板田中颇为熟稔。其时郭沫若也常来文求堂盘桓,寻访所需的文献,与田中相交甚密,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最初也是由文求堂出版的。自然,松枝曾在书店里见过郭沫若好几次,“初次见到时映入我眼帘的郭沫若,实在是一位温厚寡默的绅士,

与读他作品时所想象的形象完全不同。”^②他们三人还曾一同前往东京的浅草看戏。松枝自己曾与吉村荣吉一起,去造访过一次位于千叶县市川市的郭沫若寓所:

“玄关的纸糊的拉窗已经破落,木屐散乱地放在进门处。我们被带往了客厅,客厅中央放置着由著名的雕刻家(记得好像是林谦三)所制作的郭沫若的铜像。我们获得了铜像上铭文的拓本。郭沫若穿着和式的棉袄,下摆已经绽开垂落了下来。他对此丝毫没有感到羞怯,话语不多,语速稳健,这样的风采实在让人感到敬佩。”^③

松枝茂夫后来曾翻译过郭沫若的《北伐》(改造社 1938 年)、《创造十年·续创造十年》(岩波书店 1960 年)。

竹内好等与郭沫若的相识,大概也是在文求堂,由店主田中介绍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与竹内等研究会同人交往密切的中国留学生顾志坚等此前与郭沫若也多有往来,由留学生介绍相识的可能性也不可忽视。在后来发表的竹内当年的日记中,第一次记录与郭沫若的交往是在 1934 年 11 月 9 日:

“上午武田来,同去访问郭先生。在京浜百货公司购买点心带去。装了书的包裹颇重。呼吸到了久违的郊外空气。郭氏的神态语气如旧。说起请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会做演讲的事,私下允诺。获赠《文学》十一月号和《现代》十月号。因为他基本上不读。杂谈。大众话问题,承蒙教示。说话非常有气势。我想他不愿折节,不愿妥协,故埋首金石研究。近十二时辞出。”^④

1935 年 1 月 10 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降雨。恰好郭先生手写的贺年卡寄达。墨迹甚佳。午后,至秋叶原与谢(冰

莹)相会,同去访问郭氏。穿长靴,谢氏亦长靴。与郭氏会谈,稍稍谈及讲演会的讲演内容。郭氏的内心难测。亦非无好意。与谢氏用支那语谈《申报》稿费事。可见生活极度穷困。(下略)”^⑤

1935 年 1 月 23 日日记:

“冈崎来,商议事。请其访郭氏。……夜,访冈崎,郭氏一事,一切顺利。请其题写会刊的题名(此后出版的《中国文学月报》和后来改名的《中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学’四个字为郭沫若所题写——引者注),亦欣然应允。演讲题目有两个可选,《易》和《楚辞(离骚)》,因其最近已将《楚辞》译成现代语。”^⑥

1 月 26 日,酝酿已久的演讲会终于举行,这也是研究会的第三次例会活动。竹内的当天日记比较详细记载了演讲会的情况:

“令人热泪盈眶的盛会。出席者 104 名。(一桥)学士会馆第二号室,充溢着听讲者,座椅不敷使用。人人都在称赞会议的盛况。高田教授与竹田副教授均来。郭氏的演讲,一时半开始,逾三时结束。郭氏自己似也极为亢奋。一户(研究会主要成员——引者注)司会,极拙劣,然亦无可奈何。留学生出席者数十名,大多似见报而来。郭氏忘带衬衫袖扣的金属扣,将自己的借给他。郭氏演讲至高潮处,眉间紧锁,目光如炬。逾三时演讲结束,备茶果恳谈。”^⑦

翌日下午,竹内又会同武田、冈崎去访郭沫若,抵达时,“已近四时。郭氏热情相迎。商议文稿刊发《思想》和《同仁》事宜。借阅《楚辞》研究原稿。郭氏拟出日文版,请我们与书店交涉。聆听其有关《楚辞》和‘天道思想’的高论。我们给他的演讲费原封归还,作为给研究会的捐助,对研究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郭氏对众多的留学



生来听讲亦甚感喜悦。辞行时一再挽留,并屡屡邀请今后常来玩。”^⑥可见郭沫若本人对与研究会的合作深感满意,通过这次活动,与研究会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

这些来往,郭沫若在有关流亡日本的文字以及郭沫若的年谱中均未有任何记述。

1936年11月13日,其时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郁达夫以省政府公报处主任的身份来日本访问,名义上的使命是采购印刷机器。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在赤坂的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设宴欢迎郁达夫,并请来了郭沫若同席,同席者尚有佐藤春夫、林芙美子等名作家,参与《大鲁迅全集》翻译的研究会成员增田涉和松枝茂夫也应邀出席。研究会的《中国文学月报》上,对郁达夫已有不少介绍,竹内好自自己的毕业论文就是《郁达夫研究》,在第22号《中国文学月报》的作家论专辑上又专门撰写了一篇《郁达夫备忘录》,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24日晚,研究会在三田的料理店“阜”举行郁达夫的欢迎会,也邀请了郭沫若同席。酒席上,也许是郭沫若怕郁达夫酒醉后说漏嘴,数次接过酒杯替郁达夫代饮。当日深夜,酒宴结束后郭沫若握住武田的手反复说:“我会永远留在日本”,走出门外,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以此来迷惑日本人^⑦。这次欢迎会上,约定请郁达夫在12月5日举行的研究会第16次例会上作“中国诗的变迁”的报告,结果由于前一天郁达夫在一次留学生的集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抗日演说,遭到日本警察的禁止,不得已,只能取消郁达夫的演讲,临时改由竹内好讲“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

郭沫若在发表于1937年2月的《达夫的来访》一文中说:“郁达夫这次来日本,前后滞留了足足一个月。他来我寓里共有这三次。此外由于日本人的招待,在东京

也和他会见过三次。”但在日本人招待会上的会见,恐怕不止三次。改造社和研究会的招待,已各有一次,据郭沫若上述文章的记载,郁达夫告诉他,12月12日村松梢风等旧友要宴请他,同时也要请郭沫若,16日晚上日本笔会宴请郁达夫,也请郭沫若同席。还有一次,是非常确切的,是郁达夫在上海相识的诗人金子光晴等宴请郁达夫,郭沫若及其两个孩子也参加了,这在金子光晴的夫人三千代事后的回忆录以及与中国文学研究会有比较密切关联的文艺批评家古谷纲武撰写的《郭沫若与郁达夫的印象》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载^⑧。

郁达夫回国后曾给在日期间给予其款待的日本友人寄发感谢函,据竹内好的日记,竹内好在1937年1月18日收悉,信函云:“达夫客岁东游,备蒙照拂,私心铭感,楮笔难宣。今后将本爱家爱国之至诚,务期敦进两邦之和好。东风有便,务吝教言,业务余暇,更期涉海来游,庶几剪烛西窗,得重话巴山夜雨时也。”以上为印刷文字,另用毛笔书写:“中国文学研究已经拜读,以后乞常通信。”^⑨

周作人。

周作人与研究会的渊源可谓比较特殊。研究会对外正式宣布它的成立,就是在研究会发起筹办的周作人访日的欢迎会上。事实上,周作人也是研究会一开始就比较关注的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在《中国文学月报》第6号上,刊发了实藤惠秀翻译的周作人的随笔《苍蝇》。第9号上,刊发了增田涉的《周作人论》。增田涉曾于1931年前往上海向鲁迅乞教,在鲁迅身边盘桓数月,在鲁迅病重期间又专程赴上海探望,与鲁迅友谊极深,因而对兄弟阋于墙的周作人一方,颇多揶揄之词,他认为周作人虽然是当今中国屈指可数的优秀的文章家,其清新的笔调和文体可谓独树一帜,但

中国正面临苦难的时代,许多热血人士在泣号奋斗,而周作人则悠然地呆在苦茶庵里写些不痛不痒的所谓小品,他的所谓“通达”的人生态度,是绝不能达到“放达”的境界,“也就是说,他不过是个格局不够阔大的随笔家而已。”^⑩

在研究会的同人中,松枝茂夫可谓是对周作人最为关注,也是用功最多的一个人。在《中国文学月报》的第29号上,刊登了松枝茂夫等编录的《周作人著译目录》,搜罗比较详备,《中国文学》第60号上松枝茂夫的《周作人——传记的素描》,篇幅长达22页,对周作人的生平和文学业绩有甚为周详的介绍。松枝茂夫与周作人的初次会面,是在1934年8月研究会举行的欢迎会上,但他并未获得与其交谈的机会。1942年2月前往北京时,与同在北京的竹内好一起去访问了周作人,并长期保持了通信联络。研究会时期的松枝茂夫所翻译出版的周作人的作品集,有《北京的点心》(山本书店1936年)、《周作人随笔集》(改造社1938年)、《周作人随笔抄》(文求堂1939年)、《瓜豆集》(创元社1940年)、《结缘豆》(实业之日本社1944年)。可以说他是最早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周作人的功臣。松枝茂夫之所以欣赏周作人,这与他自己的人生态度不无关联,我们只要看他后来曾翻译出版了《浮生六记》、《陶庵梦忆》、《陶渊明全集》,大概就可看出其思想底蕴一斑了。

作为研究会领袖人物的竹内好,似乎并不怎么欣赏周作人。当初的欢迎会,是外界委托的结果。他除了写过一篇两三百字的短文《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解说》,几乎没有怎么说及他。1937年10月以后的两年,他差不多一直呆在北京,除了在寥寥几次朋友的宴请上见过周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与同在东京相识的钱稻孙、

徐祖正等倒是时常往来),1939年10月13日,“下了决心去访周作人。难得的好精神。听他说了许多话。说毛泽东当年是以二十八划生的笔名给《新青年》投稿的。二十八就是一个共字。此话甚有趣。……求他写字,还获得了李大钊、陈独秀的书简。辞出。先生书斋外,麻雀声甚吵。”^⑪以后周作人不仅出任伪职,还主动与日本占领当局倾力合作。1941年4月周末日本参加东亚文化协议会时,身为协议会会员的竹内没有与会,研究会也只在《中国文学》的编辑后记上略略一提,不再举行欢迎会。不过,在周离开东京的18日上午,竹内以个人的身份去其下榻的帝国饭店看望了他。由此也可看出研究会主流对此时周作人的态度。

谢冰莹。

谢冰莹当年是个颇具传奇性的女作家,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尚未毕业就投笔从戎,1926年冬前往武汉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受训,1927年随叶挺的革命军西征,后来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从军日记》,以后又陆续出版短篇和长篇小说,一时声名鹊起。谢冰莹1931年曾来日本呆了四个月,九一八以后回国。第二次来日本大概是在1934年的秋天。竹内好的日记中首次出现她的名字,是在这一年的11月9日,出自郭沫若之口,说谢冰莹来到了日本,想入东大或早稻田念书。竹内好第一次见到她是11月12日,谢冰莹还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就读,当时的印象是:“谢冰莹穿得破破旧旧的,小个子,有点土气。但说话颇有要领。说起丁玲,赞美她的《在黑暗中》,而觉得《水》《母亲》不行,这些都很中肯。”^⑫竹内后来读了一些谢冰莹的作品,觉得她的小说《抛弃》很无聊,但《梅姑娘》不错,想动手翻译。

后来谢冰莹差不多成了研究会的一



员,在研究会的第二次例会上,主持人武田泰淳正式向大家介绍了她。在12月9日举行的研究会的第一次恳话会上,请谢冰莹主讲了“我的文学经历”,由拓殖大学的土屋明治为她担任翻译。后来谢冰莹向竹内提出希望找一个日本人互教日文和中文,经竹内和武田介绍,研究会成员千田九一就每周去一次谢冰莹所住宿的位于东京东中野附近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宿舍(称为东野学寮)互教互学。

除了竹内,与谢冰莹交往较多的是武田。位于长泉院内的武田的家还算比较宽敞,每周总有两三次,有中国留学生到他这里来,谢冰莹也常跟着去,谈论各种文学或其他话题。她总说自己是很天真直率的,武田后来回忆说:

“她举止动作并不怎么在意别人,也不左顾右盼,说话很率直,这样判断她也没什么错吧。……对她的作品我也没什么兴趣,一次也没读过,对她的性格,也没什么反感。当时我对她感到不满的一点,就是她缺乏一个女子的魅力。脸上看上去没什么血色,瘦削的双肩斜斜的耷拉着,我当时曾想,她要是再漂亮些就好了。不过,为人很爽直,完全不令人感到不快,即使动作有些粗暴也不会在意。”^③

后来谢冰莹对武田说想迁居到目黑一带,于是武田就给她介绍了一处朋友开设的小公寓,在那里谢与一位姓黄的研究生物的男子同居了。这一年的4月初开始,谢冰莹与黄姓男子一同到武田家里学习日文。不料,武田却因谢冰莹而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大约在第二次或第三次结束之后,武田送他们两人回住处,并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之后回到家,正在沐浴时,特高科的警察上门将他带到了目黑警署,并因此入狱一个半月。

自1920年代末起,日本社会的白色恐

怖日益浓厚,共产党等左翼组织被数度镇压,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士屡屡受到警察的调查。武田泰淳本人在学生时代就曾参加左翼活动被警方三度拘留,可谓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经常受到警察的追踪和调查,谢冰莹的言行早就受到了警方的注意。1935年4月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来日本访问,日本当局怕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抗议和袭击,就将他们认为的危险分子一概抓捕起来,谢冰莹和黄姓男子就在那天夜晚被抓到了警署,在受到审问逼供20天后被释放了,武田则被关了45天才放出来。关于这段经历,谢冰莹在1940年出版了日记体的《在日本狱中》,武田则在战后撰写了《谢冰莹事件》,刊登在复刊后的1947年的《中国文学》101号上。

这一事件对武田打击颇大,他后来回忆说:“我这样老实本分、这样消极地生活竟然也会受到怀疑,我在研究会的工作中所怀抱的光明的希望,与留学生交往的乐趣,这些充满了甜美梦想的日常人生,突然被丑恶的现实都撞碎了。”^④

1936年,谢冰莹出版了小说《一个女兵的自传》,松枝茂夫将其翻译了出来,刊登在1938年的《中国文学月报》第35号上。

俞平伯。

俞平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比较活跃,1919年与朱自清一起创办中国最早的新诗杂志《诗》,他的新诗集《冬夜》曾风靡一时,《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更是脍炙人口。但不久他似乎就从新文坛中息影,专心于红楼梦等的研究。因此,着力于现代文学的研究会对他的关注也较少,只有在《中国文学月报》第3号上刊登过一篇目加田诚的《俞平伯氏会见记》,记录的都是有关《红楼梦》的话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部分作家和学



者都纷纷南下,但俞平伯则未有移动,他只是迁出原先任教的清华园(清华主体已南迁),蛰居于北京老君堂。他谢绝了周作人等邀他出任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只在私立的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授,不过与周作人等仍然时有过从,他们毕竟是五四以来的旧友。

1937年10月至39年10月,竹内好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在北京游学两年,检阅其日记,期间与俞平伯似乎并无交往。但研究会的成员其实都知晓俞平伯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地位。1942年,竹内好从其所供职的回教圈研究所获得一笔经费,到中国做相关调查,在北京勾留期间,与同在北京的松枝茂夫一同去拜访了俞平伯。竹内之后在《旅日记抄》中详细记录了此事,译述如下,虽然有点长,但诚可作为一种史料:

“访问俞平伯氏,是在离开北京的两三天前。我和松枝一起,从南池子坐了三轮车,在有些云翳的寒冷的上午,向老君堂进发。在此前的一天,应周作人氏的邀请,在松枝的陪同下,在八道湾新粉刷过的餐室里,受到了很恳切地招待。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俞平伯氏。与想象的不一样。想象中,应该是更加潇洒,更加才气纵横。这些是从他的文章中获得的印象。意外的,俞氏竟像一个乡下老汉般的素朴。在照片中见到的俞氏,有一种厚重的威严感,但实际拜见了后,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只能用素朴这两个字来形容。所以从一开始就觉得很容易亲近。其实我的眼光太浅了。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双重印象,在次日早上,前去访问了俞氏。

南小街变得相当的气派,我都有些不认识了。从南小街向东拐,来到了城墙附近。他的寓所是在南边。看上去很古旧。我们被带往的,是一重又一重院子的最里

端。并不太宽敞,朝南的三间,其中两间宽的房间,被布置成客厅似的。感觉上实在是很素朴。家居摆设比较粗陋。一整面的墙上,挂满了书画。南窗边有一个较大的书桌,一切都带着一种沉凝的古色。没有一件亮丽的物件。俞氏的文章,我没有读过太多,但喜欢。觉得这是一种颇具色彩感的风格。所以,见到这颜色沉暗的客厅,也使我感到很意外。也许,我还不大懂得文章。俞氏自己给我们沏茶,还款待我们香烟。放香烟的,是一个像是箱根木制品似的木雕的鸟,动一下,鸟就会将香烟一根根地衔出来。俞氏用那只笨拙的手,不苟言笑地从那像小孩玩具似的木制盒子中将香烟一根根掏出来,衔在鸟嘴上递给我们。我们赞美了一下后,他又从那种比较廉价的火柴盒中取出火柴棒,划了好几次也没划着,我们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就自己来划,他也不见外。小个子的身躯动作缓慢,坐着的两条腿翘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翘起来,像个机器人似的。他时常扶扶深度的近视眼,说话稍稍有些口吃,说的北京话带有很重的方言口音。问他什么,他都漫不经心地回答。松枝对我说我正在翻译废名,他答说废名的文章自己也不大懂,我听后不知如何应答。松枝看到书桌上的照片,就说,啊,这是俞曲园先生吧,于是他就像个橡皮人似的站了起来,取过照片让我们看。我觉得俞氏有点不大开心。看着他的动作,听着他的讲话,我觉得我们没法再坐下去了。这个人的文章,是诚实的。我再去读一遍《杂拌儿》吧。这间没有色彩的、沉闷的房间的主人,一定会出现在这本书里。俞氏每周在中国大学讲两节《论语》课。他给了我们他论文的抽印本。想要拜读的话恐怕也看不懂吧。辞出的时候,门前停着一辆洋车。回去的路上,下雨了。”^⑤

竹内的这篇比较生动而又真实的文



字,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俞平伯在蛰居北京时期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他对中国文学研究会并无多少了解,在那一时期,他也不想了解。只是出于礼貌,他接待了这两个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人,仅此而已。

从日文的文献记录来看,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在东京和中国交往较多的中国文人还有王莹(电影明星和作家)、钟敬文、徐祖正(几乎与郁达夫同时期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早期创造社成员之一,在日本文学和西洋文学方面皆有出色的贡献)和尤炳圻(早年留学日本,曾译有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等),因篇幅原因,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结 语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里,中国文学研究会无疑是一个组织最为完整、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研究成果最为卓著、在当时以及后来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团体。即使研究会完全解体和杂志彻底停刊之后,当年的主要成员对中国文学乃是中国社会的研究也丝毫没有停息。

竹内好以他的研究著作《鲁迅》和具有权威性的鲁迅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奠定了他在日本鲁迅研究界第一人的地位。他在战后还热切关注中日关系,研究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亚洲主义思潮,并且颇为敬佩毛泽东。同时他也是一位斗士,曾勇猛地投身于1960年代初期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为抗议政府的决定,他毅然辞去了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的职务。他曾连续撰写了三集《为了了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论》,力图将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诉诸于日本民众。但同时他却三次拒绝了新中国政府的邀请,自1946年离开之后就没有再踏上中国一步。

武田泰淳在1937年10月被征兵入伍,派往中国战场,虽然未直接在前线作战,但两年在中国的实际体验,使他对中国的认识变得深刻,194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司马迁》。1944年6月为躲避战争后期日本社会的黑暗,他主动要求前往上海,在中日文化协会下的东方编译馆供职,并在上海经历了日本的战败。这些人生经历,使他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小说家,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为模特儿的《风媒花》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以秋瑾事迹为题材的《秋风秋雨愁杀人》是他的另一部卓有影响的长篇,他始终热切关注着中国,出版了评论集《我的中国抄》、《黄河入海流》、《扬子江畔》等等,应中国政府邀请,三度访问了新中国,写了许多介绍新中国的文字,甚至一度对文化大革命发出了赞美之词。

研究会创始人之一的冈崎俊夫,不幸在1959年便早早去世,但他在翻译介绍中国文学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先后翻译出版了丁玲的《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散文集《我的青春我的梦》,巴金的《寒夜》、《憩园》,郭沫若的《亡命十年》、《洪波曲》,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其他主要成员如松枝茂夫、实藤惠秀、增田涉、小野忍等,都是中国文学研究界中的佼佼者,弟子满天下,限于篇幅,这里难以一一叙述。

今天我们在检讨20世纪以来中日文学关系时,对曾经是重要存在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充分了解和评价,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 据立间祥介编《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该年谱编订后经当年尚健在的有关成员审定过,但事

实上仍有一些错误),收录于《复刻 中国文学》别册,东京汲古书院 1971 年;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 1934 年日记》,最初发表于 1972 年 11 月发行的杂志《边境》第 9 号,后收录于《竹内好全集》第 15 卷。

② 在日本并无“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说法,尤其是作为该组织中枢的竹内好对战后复活的该组织一直不予认可。但笔者认为事实上存在着“第一期”和“第二期”。

③ 本多秋五《物语 战后文学史》(中),第 251 页。东京岩波书店,1992 年。本文所引用的日文文献,均由笔者直接译自原文。对于固有名词的“支那”和“中国”,完全按照原来的汉字词语,不作改动,以存历史的真实。

④ 竹内好《孙文观的问题点》,初刊于 1957 年 6 月号《思想》杂志,《竹内好全集》第 5 卷,第 25 页,东京筑摩书房 1981 年。

⑤ 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序章 我的回想》,第 16 页,东京创书社,1978 年。

⑥ 武田泰淳《司马迁·自序》,东京日本评论社 1943 年,此处引自《武田泰淳全集》第 10 卷,第 3 页。

⑦ 竹内好《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第 60 号,1940 年 4 月发行。

⑧ 竹内好《1934 年日记》,《竹内好全集》第 15 卷,第 43—45 页。

⑨ 关于文求堂书店和店老板,郭沫若在《跨着东海》一文中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可参阅。

⑩ 详见竹内好《1934 年日记》,《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竹内好年谱》(《竹内好全集》第 16 卷,东京筑摩书房 1982 年)。

⑪ 《中国文学月报》第 1 号,第 12 页,中国文学研究会 1935 年 3 月 5 日发行。

⑫ 这部分内容部分参考了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的研究》中的第二篇《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的考察》,东京吉川弘文馆 1984 年。

⑬ 竹内好《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2 年 11 月发行的《中国文学》第 89 号,第 265—266 页(该杂志按卷编排页码)。

⑭ 《中国文学》第 92 号,第 313 页,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东京生活社 1943 年 3 月发行。

⑮ 《中国文学》第 93 号,中国文学研究会编

辑,东京生活社 1946 年 3 月发行。

⑯ 竹内好《备忘录》,收录于竹内好《鲁迅杂记》,世界评论社 1949 年。

⑰ 松枝茂夫《〈中国文学〉复刻刊行语》,《松枝茂夫文集》第二卷,第 188 页。东京研文出版 1999 年。

⑱ 这部分主要参考了立间祥介编《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竹内好著作目录》(《竹内好全集》第 17 卷)、《松枝茂夫略年谱·著作目录》(《松枝茂夫文集》第 2 卷)、《冈崎俊夫编译书目》(《冈崎俊夫文集》)、《武田泰淳年谱》(《武田泰淳全集》别卷 3)等。

⑲ 松枝茂夫《关于郭沫若的回想》,《松枝茂夫文集》第 2 卷,第 142 页。东京研文出版 1999 年。

⑳ 同上,第 143 页。

㉑ 同上,第 144 页。

㉒ 竹内好《1934 年日记》,《竹内好全集》第 15 卷,第 75—76 页。

㉓ 竹内好《1935 年日记》,同上,第 86 页。

㉔ 同上,第 91 页。

㉕ 同上,第 92 页。

㉖ 同上,第 93 页。

㉗ 据立间祥介编《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复刻 中国文学》别册,第 52 页。

㉘ 详细请参见森三千代《“放浪”前后(2)》,《金子光晴全集月报第 13 回第 11 卷》,1976 年,第 5—6 页。古谷纲武《郭沫若与郁达夫的印象》,载东京《中国文学》月报第 44 号,1938 年 11 月 1 日。

㉙ 据《复刻 中国文学》别册第 81 页影印件,标点为引者所加。

㉚ 增田涉《周作人论》,《中国文学月报》第 9 号,第 98 页,1935 年 11 月 27 日发行。

㉛ 竹内好《北京日记》,《竹内好全集》第 15 卷,第 338 页。

㉜ 竹内好《1934 年日记》,《竹内好全集》第 15 卷,第 76 页。

㉝ 武田泰淳《谢冰莹事件》,收录于武田泰淳《黄海入海流——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学》,第 222—223 页,东京劲草书房 1970 年。

㉞ 同上,第 225 页。

㉟ 竹内好《旅日记抄·俞平伯氏》,《中国文学》第 85 号,第 147—148 页,1942 年 6 月 25 日发行。